



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概念形式表征的对比研究

尹铂淳,张义琳,肖 澍,余瑱臻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该研究以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为研究对象,对比了两地方言形式单位概念的突显成分;接着,对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结构式的数量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两地方言形式单位多见于偏正式,其次为动宾式;再者,该研究发现较临沂方言形式单位而言,邵阳方言形式单位中的直陈式更多,且于二者中,转喻式皆最多;最后,该研究总结出了三点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概念形式表征的不同之处,并指出了造成上述差异的动因,有利于两地人认知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研究与认识。

关键词:邵阳方言;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概念框架;概念形式表征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5) 01-0009-06

邵阳市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南接广西龙胜县、资源县、全州县。总面积 20829 平方公里,以汉族为主,有苗、瑶、回等少数民族。临沂,因濒临山东省第一大河沂河而得名,中国人居建设模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临沂古属东夷,是东夷文明的源头之一。面积 17184 平方公里,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邵阳方言和临沂方言在湘、鲁方言中是较具代表性的,理由有二:

第一,两城历史悠久,均有着 2500 余年的历史;

第二,两城经济尚可,但远不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故外来务工人员较少,语言的“纯净度”则高。

又因形式单位承载概念、能展现出当地人的命名机制,故以邵阳、临沂方言中的形式单位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语料的收集主要以当地人口述的形式单位为主,且筛选的条件如下:方言形式单位需拥有相对应的汉语普通话形式单位。

语料收集的对象:

尹铂淳,男,湖南邵阳人,25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精通邵阳话,普通话标准;

黄江宁,男,湖南邵阳人,26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精通邵阳话,普通话标准;

宁孟智,男,湖南邵阳邵东人,26 岁,本科学历,精通邵阳话,普通话标准;

何桃萍,女,湖南邵阳人,50 岁,高中学历,精通邵阳话,普通话不标准;

王坤,男,山东临沂莒南人,24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精通临沂话,普通话标准;

罗琴晴,女,山东临沂莒南人,51 岁,小学学历,

收稿日期:2014-12-20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名词性网络新词的认知语义研究”(项目编号:CX2014B215)。

作者简介:尹铂淳(1989-),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 201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张义琳(1990-),女,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 201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肖澍(1983-),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 201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余瑱臻(1988-),女,湖南娄底人,湖南师范大学 201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精通临沂话,不会讲普通话;

邓文武,男,山东临沂人,55岁,初中学历,精通临沂话,普通话不标准。

本研究之语料临沂方言形式单位多源自临沂市,少许源自下属县城莒南;邵阳方言形式单位多源自邵阳市区,少许源自下属县城邵东。

黄善娟分别从词形、语义和语法三个层面,将临沂方言词和普通话词进行对比分析。^[1]刘赛群对邵阳市邵东县方言中的词进行了相关探究,列举出了约5000个常用词,并对其进行了注音和普通话释义。^[2]其他之研究,多以语法、语音为切入口。^{[3][12]}

国内学者之于上述研究的成果颇丰,但尚未有学者对比过两种方言形式单位概念形式表征的差异,且未关注方言形式单位生成的经验基础和概念基础。本文欲以此为切入口,尝试找出二者于概念形式表征层面的差异,并尝试找出导致差异的可能动因。

一、概念框架

“框架”(frame)这一术语频见于多个学科之中,然其定义并不完全相同。20世纪60年代,“框架”(frame)这一概念被引入语言学,框架语言学的诞生为词汇和语法研究提供了一种基于认知的研究方法^{[13]205}。菲尔莫尔(C. Fillmore,美国语言学家)认为“框架”(frame)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的术语,能用来涵盖诸如“图式”(schema)、“脚本”(script)、“情景”(scenario)、“观念框架”(ideational scaffolding)、“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民俗理论”(folk theory)

等各种认知语言学术语。^[14]

廖光蓉进一步发展了框架理论,他将词概念框架定义为:“以最初的那个词概念为起点的百科知识网络,这个起点词概念便是框架里的中心概念;框架里包含了各种类型的范畴,它们皆为经验图式化的结果;随着人类经验日渐丰富,框架中的内容不断刷新和改变;框架是知识表征的基本方式,是有逻辑结构层次的,是动态的”。^[15]之于形式表征,廖光蓉指出,形式表征是一个用以表征概念的形式单位。^[16]

人类的注意力往往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好用事物的突显且简洁的部分去指代该事物没那么突显且复杂的部分。^[17]同样,人类好使用语言突显且简洁的部分概念去指代没那么突显且复杂的概念;接着,该部分概念被载于相应的形式单位之上,这样的形式表征无疑提升了言语表达的经济性。如“藏獒”表征的为事物概念“一种产自于青藏高原,拥有神威外形,高贵气质,像狮非狮,似虎非虎,凶猛异常的大型犬种”。体现在形式单位层面的并非所有概念,仅是部分突显概念,于存现事件概念框架“葵生活在西藏”中,施事为“葵”,行为为“生活”,行为的地点为“西藏”,该事件概念框架中有众多元素,仅突显了“产地”和“施事”。再如《诗经》中的复合词“宵行”,其表征的为事物概念“萤火虫”,其拥有众多元素,仅突显了属性元素“晚上行动”。

二、突显成分、结构式对比

(一)突显成分对比

表1 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概念突显成分的对比表

| 邵阳方言形式单位及其概念的突显成分(斜线) | 临沂方言形式单位及其概念的突显成分(斜线) | 表征的核心概念 |
|-----------------------|-----------------------|------------------------------|
| 稀粪浓度、所指 | 薄屎厚度、所指 | 不成形,形似溏泥的大便 |
| 灶屋烹饪的平台、场所 | 锅屋烹饪的工具、场所 | 用来烹饪的场所 |
| 三粒睾丸男性内生殖器官及其数目 | 青头子头发颜色 | 做事不沉稳、不老道的人 |
| 土砖房材质、颜色、场所 | 土屋材质、颜色、场所 | 以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屋子 |
| 扫屋动作、场所 | 扫当门动作、位置 | 打扫屋内的地面 |
| 带崽伴随、对象 | 养活孩子动作、生命状态、对象 | 抚养小孩 |
| 怀了小孩 动作、对象 | 在身上位置 | 卵子受精后形成活的合子;孕育产生子代的过程 |
| 生个崽动作、对象 1 | 添喜动作、对象 2 | 生下孩子,为家添了人口 |
| 土狗乡土气息、物种 | 大黄体型、颜色 | 农村里的大黄狗 |
| 热水瓶所装“内容”、容器 1 | 暖壶保暖功能、容器 2 | 用以保温的瓶子 |
| 竹刷把材质、动作、持有方式 | 饭帚作用的对象、形状 | 做饭用的类似扫帚的工具,一般用来刷锅和清理切菜的案板 |
| 茅厕材质、场所 1 | 茅房材质、场所 2 | 由人类建造专供人类进行生理排泄和放置(处理)排泄物的地方 |

| 邵阳方言形式单位及其概念的突显成分(斜线) | 临沂方言形式单位及其概念的突显成分(斜线) | 表征的核心概念 |
|-----------------------|-----------------------|---------------------------------------|
| 剥树砍伐的动作、受事 | 杀树杀人的动作、受事 | 砍伐树木 |
| 手电筒用以把持的部位、能源来源、形状 1 | 电棒子能源来源、形状 2 | 一种手持式电子照明工具 |
| 癞子脑壳能导致秃头的病、部位 | 秃蛋子毛发稀少、头的形状 | 指头发脱落过多而形成的发型 |
| 打赤膊裸露、上臂 | 光肉儿裸露、肌肤 | 裸露上身 |
| 猪脑壳猪脑 | 愣子呆滞 | 糊涂且不明事理的人 |
| 包谷动作“包覆”、施事 | 棒子形状 | 玉米,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呈棒子状,有谷粒覆盖 |
| 波丝网的形状、网的材质 | 八爪脚的数目 | 一种有毒腺、无触角、无翅、一般有八只脚、会织网的生物 |
| 放炮仗燃放的动作 1、燃放的对象 | 放鞭炮燃放的动作 2、燃放对象的形状 | 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习俗,始用于驱魔避邪,现用于传统节日、婚礼喜庆等场合 |
| 肚子叫导致的后果 1 | 饥困导致的后果 2 | 肚子很空,想吃东西 |
| 萤火虫光亮、类属 | 狗屎明形状、光亮 | 一种身体黄褐色,腹部末端有发光器,夜间能发出的带绿色荧光的昆虫 |
| 手背身体部位、背部 | 手面子身体部位、脸面 | 手掌的反面 |
| 讲得来交流融洽 | 对撇子习惯用手一致 | 形容两人容易相处且配合得心应手 |
| 出鼻子水从内至外的方向、部位、溶液及其特性 | 淌鼻涕溪水、河水的运动方式、运动的对象 | 鼻部疾病常见症状之一,可经前鼻孔流出,也可后流入鼻咽部。(流鼻涕) |
| 单车单侧性、类属 | 脚扎车动力来源、类属 | 以脚踏踏板为动力,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 |
| 甘蔗根类属、形状 1 | 甜杆味道、形状 2 | 种植在地里,茎似竹而内充实,长六七尺,粗数寸,根下节密,身上渐疏。(甘蔗) |
| 青年伢子年轻 | 劳力属性“可进行劳作” | 指十五、六岁至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
| 种地动作、动作的场所 | 下地(园)动作的方向(路径)、目的地 | 耕种田地,指以务农为生 |
| 乡里人样打扮特征 | 庄户脸面部特征 | 像农村人一样 |
| 放烟花动作、属性、形状 | 放花动作、形状 | 放烟火 |
| 行亲戚家动作 1、动作 1 的终点 | 走亲动作 2、动作 2 的终点 | 去亲戚家串门 |
| 惹事动作 1 | 作孽动作 2、佛教用语 | 引起麻烦或祸端 |
| 煮饭烹饪方式、对象 | 捞米煮饭前的一个步骤 | 煮米饭 |
| 一天到晚整个时间段、白天到晚上 | 一天三时整个时间段、三顿饭 | 从白天到晚上的那段时间 |
| 靠得住可依靠 | 倚实可依靠、踏实 | 可靠,信得过 |
| 回屋里去动作、目的地、方向(路径) | 家走目的地、动作 | 回到家去 |
| 飘着的状态 | 不着调音乐中的调子 | 不可靠的 |
| 煮碗汤烹饪方式 1、容器、烹饪的结果 | 熬菜烹饪方式 2、原料 | 将菜倒入锅内煮 |
| 没有办法原因 | 没治结果 | 无力回天的结局 |

基于表 1, 我们可清晰看出两地方言形式单位概念的突显成分不尽相同, 甚至有较大之差别, 即于

概念形式化这一过程中, 两地人民观察的视角有较大的差别。

(二)结构式对比

表2 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结构式数量对比

| 结构式 / 比例 | 并列式 | 主谓式 | 偏正式 | 动宾式 | 补充式 |
|----------|------|------|-------|-------|-------|
| 邵阳方言形式单位 | 0 | 2.5% | 45.0% | 35.0% | 17.5% |
| 临沂方言形式单位 | 7.5% | 0 | 40.0% | 35.0% | 17.5% |

基于上述表格,不难看出,两地方言形式单位的结构式多见于偏正式,这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基于现存知识结构基础之上的,新概念的建立离不开已有的语言经验。故人类习惯对已有形式单位进行次范畴化,即给现存的形式单位加上修饰语,对其进行次范畴化,从而达到扩展语义的效果。

三、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概念形式表征之差异

(一)隐喻、转喻、直陈式所占比例不同

隐喻的传统研究普遍将隐喻同转喻视为两种修辞手段,现代的认知语言学家则更多地将隐喻和转喻视为两种认知操作。莱考夫(G. Lakoff,美国语言学家)指出,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能够反映出人类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借用一个相对熟悉的事物去理解或说明另一相对陌生的事物,且俩事物间具有系统的相似性^[18];概念转喻理论(conceptual metonymy theory)提供人们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用隶属于同一概念框架的较突显部分去指代不那么突显的部分。^[19]经分析可知,两地方言形式单位中隐喻、转喻、直陈式所占比例不尽相同^[20],如下所示:

表3 两地方言形式单位中隐喻、转喻、直陈式所占比例对比表

| 认知操作 / 比例 | 隐喻式 | 转喻式 | 直陈式 |
|-----------|-------|-------|-------|
| 邵阳方言形式单位 | 20.0% | 42.5% | 37.5% |
| 临沂方言形式单位 | 40.0% | 47.5% | 12.5% |

从表格中不难看出,较邵阳方言形式单位而言,临沂方言形式单位中转喻式最多,隐喻式次之,直陈式甚少;反观邵阳方言形式单位,转喻式最多,直陈式其次,隐喻式最少。

无论邵阳方言形式单位亦或是临沂方言形式单位,转喻式都是最多的,这并非偶然,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转喻是一种较隐喻更常用、基础的思维方式,原因如下:人类更愿意对已有的经验或概念进行次范畴化,最好例证便是汉语形式单位中数量最多的构式是偏正式这一现象^[21];其次,隐喻思维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要求更高,反观转喻思维则简单、易上手的多,小孩经常会用一些拟声词如“喵喵”、“咯咯咯”来指代具体的发声物,而非用一个与该事

物具有系统相似性的事物来指代;此外,隐喻要求掌握的相关知识结构更为繁杂,转喻的则相对简单。我们认为,转喻是一种较隐喻更常用、基础的认知操作。这也就不难解释,在两地方言形式单位中,为何转喻式所占比例皆最大。

(二)概念形式化过程中说话人观察的视角不同

基于表1,可以得知,概念形式化过程中,当地居民拥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如,十五、六岁至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邵阳方言称其“青年伢子”,临沂方言称其“劳力”,前者突显了“年轻”,后者则突显了概念的“可劳作性”。邵阳人对于青年的认识可能停留于年纪层面,而临沂人可能更多地将青年视为一个劳动力。再如,邵阳方言形式单位“没有办法”突显出了概念“无力回天的结局”中的“原因”,而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没治”则突显出了“结果”这一子概念。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于表1中,二者概念突显的成分存在诸多不同,此由说话人观察视角的不同导致。

(三)概念形式表征的特征不同

1.临沂方言形式单位经济性较强,象似性较弱

经观察,上述临沂方言形式单位几乎都比邵阳方言形式单位简洁。如,“家走”便远比“回屋里去”经济,反现象似性层面,近乎直陈的后者远强于前者,其更易为人理解。再如,邵阳方言形式单位“放炮仗”,象似性极强,为直陈式,但其经济性却不敌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放鞭”,后者的强经济性也赋予了其在解读上较强的模糊性以及之于语境较强的依赖性。

2.临沂方言形式单位的表达较艺术

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杀树”是一种拟人的说法,因为树不是人,自然,无被杀这么一说,这种超常表达无疑体现出了临沂方言形式单位较强的艺术性。根据表3不难看出,临沂方言形式单位仅有12.5%为直陈式,隐、转喻式偏多,反观邵阳方言形式单位,近半数为直陈式,这便说明较邵阳方言形式单位而言,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更艺术。

3.邵阳方言形式单位表达较粗俗

邵阳方言中,做事不沉稳、不老道的人常被成为“三粒睾丸”,这是一个典型的“部分代整体”构型的转喻,类似的有“屌丝”,二者相较,“三粒睾丸”更显粗俗。反观临沂方言形式单位中,几乎没有此类表达。表1中,类似的邵阳方言形式单位还有“猪脑壳”等。

尹铂淳,张义琳,肖澍,等: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概念形式表征的对比研究

四、造成差异的动因

(一) 地域差异

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究竟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 Sausure, 瑞士语言学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地理上的分隔是造成语言差异的重要因素。^[21]人类的生活离不开高山、江河,方言的差异性和必然会与其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指出,人类对周遭世界进行体验产生经验,经验进一步被概念化为相关概念,最终,概念以形式单位为载体被表征出来。^[23]不同的环境给予了人类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观察视角,自然会获得不同的概念形式表征。这便不难理解,为何相隔千里的邵阳同临沂会拥有如此不同的概念形式表征。

(二) 南北民俗差异

笔者生于南方,也曾去过北京、内蒙古、河南等北方省份,感受过当地的民俗,深感南北民俗差异之大。大部分北方人不喜好做生意,他们更愿意老实地过日子。老话有云:无奸不商。毋庸置疑,南方人的“小聪明”自然是高过北方人的,四处做生意的邵阳人便是最好的佐证。有了小聪明,人自然不愿脚踏实地,继而变得浮躁;反观北方人民,大部分都甘于平淡的生活,不浮躁,对生活中琐事的观察也就更仔细、用心,涉身体验较南方人更丰富,表达自然更倾向使用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去指代其他较陌生之事物。基于上述表格发现,邵阳方言中的形式单位于表达上很是单调,隐喻过程中喻体不超过四个;相反,临沂方言中的形式单位在表达上则丰富得多,光喻体便有不下十个。再者,古时候南方一直是皇帝流放犯人的“牢狱”,大批犯人押送至此,南方的民风自然不会很好,这便导致了南方方言的粗俗化。

五、结语

邵阳、临沂相隔千里,地域上的差异必会表现于当地方言形式单位概念形式表征之上,故对概念形式表征进行研究,亦是对两地人的认知模式和文化模式进行研究,颇具意义。

因文章篇幅以及笔者能力有限,故本研究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对二者差异之动因分析过于浅显;

第二,本文语料不够丰富,难具备强说服力。

总之,本研究尚处起步之阶段,笔者还将陆续发表相关论文深化该研究。

参考文献:

[1] 黄善娟.临沂方言词汇研究[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13.

[2] 刘赛群.湖南邵东方言词汇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3] 孙叶林.邵阳方言双宾句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

[4] 孙叶林.邵阳方言特殊双宾句 S+V+O_直+O_间 [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38-142.

[5] 孙叶林.邵阳方言双宾句的动词与双宾语序 [J].船山学刊,2005,(4):49-51.

[6] 王耀辉.临沂话与普通话的语法差异[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25(5):97-98.

[7] 解直委.沂水方言“子”尾的语法特征与语法作用[J].临沂大学学报,2013,35(4):92-94.

[8] 陈建伟.临沂(相公)方言语法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4.

[9] 龙国莲.邵阳方言声母历史层次初探[D].南宁:广西大学,2008.

[10] 李小军.邵阳方言语气词“咱”“啊”的鼻化别义[J].语言研究,2012,(4):99-101.

[11] 鲍厚星.湖南邵阳方言音系[J].方言,1989,(3):196-207.

[12] 陈立中.汉语方言声调送气分化现象初探[J].汉语学报,2005,(4):31-39.

[13] Ungerer, F. &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14] Fillmore, C. J. 1982. Frame semantics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C].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111-137.

[15] 廖光蓉,杨明星.词概念框架研究提纲 [J].外语教学,2008,(6):38-42.

[16] 廖光蓉.词概念框架元素的语言形式表征研究 [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17] 尹铂淳,陈萍萍.从“概念整合理论”看英语形式单位的“非常规”意义建构——以“Blue X”,“White X”为例[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4):114-118.

[18] G.Lakoff,G.&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19] 沈家煊.转指和转喻[J].当代语言学,1999,(1):3-15.

[20] 尹铂淳,张懂.汉语新式复合形式单位超常的认知研究[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4):27-31.

[21] 尹铂淳.汉语复合词“超常”组合的认知研究[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1):49-53.

[2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3] 尹铂淳.汉语词意义建构模式及意义演变机制的认知研究——以“红”、“白”等词为例[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16-21.

[责任编辑:许海燕]

A Contrast Study of the Concept Formal Representations of Shaoyang and Linyi Dialect Formal Units

YIN Bo-chun¹,ZHANG Yi-lin²,XIAO Shu³,SHE Zhen-zhen⁴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aking Shaoyang and Linyi dialect formal units for studying objects, first, the study contrasts highlighting elements from the two dialect formal unit concept frames; moreover, the study contrasts the number of structural formulas in Shaoyang and Linyi dialect formal units; and finds that compared to Linyi dialect formal units, Shaoyang dialect formal units are more of indicatifs and in both of them, metonymic patterns have the biggest proportion; otherwise, the study summarizes thre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formal representation of Shaoyang and Linyi dialect formal unit.at las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wo causes for these differences.

Key words: Shaoyang dialect; Linyi dialect; formal unit; concept frame; concept formal representation

(上接第 8 页)

- [4] 张华滨.唐代文化名门的典籍收藏与保存[J].泰山学院学报,2006,(2). 2006.
- [5] (清)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 刘昉,等.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M].上海:汉语词典出版社,2004.
- [7] 贺亚先,等.湖北历代诗歌精选[M].武汉:武汉出版社,
- [8] 张高荣.龙泉山古诗词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 [9] (清)王庭楨,彭崧毓.江夏县志[M].台北:成文书局,1975.
- [10] 涂明星.一场土地官司相持 154 年 [J]. 武汉文史资料, 2014,(5).

[责任编辑:石芬芳]

On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Li's Library in Jiangxia

TU Ming-xing

(Wuh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oftware and Engineering, Wuhan430205, China)

Abstract: Wan Juan library, a famous family library located in Lingquan Mountain, Jiangxia county, Ezhou province (Hubei today), was first built by the Prime Minister Li Yong in Tang Dynasty(618-907AD) and then rebuilt by four younger generation of Li's family, especially Li Xi. Li's library served as book collecting and reading place for about 800 years (witnessing Tang Dynasty, Song Dynasty, Yua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It was destroyed by the Dependent State Chu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Despite long history, the private library with a large number of valuable books survived as archaeological relics. The paper maintains that it helps to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social culture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enhance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social culture of Jiangxia; Li family in Jiangxia; Wan Juan library;root